



大学经典

荀子

[唐]杨倞注

东方朔 导读
王鹏 整理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荀子

[唐] 杨倞 注

东方朔 导读 王鹏 整理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荀子/(唐)杨倞注;东方朔导读;王鹏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8

(世纪人文系列·大学经典)

ISBN 978-7-5325-5482-9

I. 荀… II. ①杨…②东…③王… III. ①儒家②荀子—
注释 IV. B222.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15762号

责任编辑 童力军

装帧设计 陆智昌

荀子

[唐]杨倞注 东方朔 导读 王鹏 整理

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020 上海瑞金二路272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960mm 1/16

印 张 24.75

插 页 4

字 数 432 000

版 次 2010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0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5-5482-9/B·681

定 价 38.00元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含“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

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

“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7年1月

荀 子

导 读

东方朔

荀子名况，又称荀卿、孙卿，战国后期赵国猗氏（今山西安泽）人，著名的思想家，先秦继孟子之后儒家最重要的代表，也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据司马迁《史记·孟轲荀卿列传》记载：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辨，爽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以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疾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机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滑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上述文字一直被认为是有关荀子之生平的最早记载，然而，据后世史家考证，其留下的问题也一样繁多。荀子确切的生卒年月已

不可考。依胡适之说：“荀卿生死的年代最难确定。请看王先谦《荀子集解》所录诸家的争论，便可见了。最可笑的是刘向的《孙卿书序》。刘向说荀卿曾与孙臧议兵。孙臧破魏在前三四一年。到春申君死时，荀卿至少是一百三十四岁了。又刘向与诸家都说荀卿当齐襄王时最为老师。襄王即位在前二八三年，距春申君死时，还有四十五年。荀卿死在春申君之后，大约在前二三零年左右。即使他活了八十岁，也不能在齐襄王时便‘最为老师’了。我看这种种错误纷争都由于《史记》的‘孟子荀卿列传’。”^[1]按胡适自己的推算，若荀子五十游齐，则荀子的生年应在公元前305至公元前300年之间，而死于兰陵即大约在公元前230年左右。不过，胡适之说也是诸说之中的一说而已。汪中作《荀子年表》，以为荀子生平大事主要在赵惠文王元年到赵悼襄王七年之间，亦即在公元前289—前238年之间，但这种说法亦存争议。据《史记·儒林传》云：“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尊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据钱穆先生考证，威王卒于周慎靓王元年，故荀卿游学当在威王晚世。全谢山《鮑埼亭集外编》则谓“考儒林传，齐威王招天下之士于稷下，而荀子客焉”，依钱穆，即是指此，其后又曾至燕。至燕王让国子之，为慎靓王五年，去威王之卒已四年。所以钱先生认为，其时荀子至少亦当有二十四五岁。若由是而上推，则荀子之生年当在周显王三十年前；循是而下究，至春申君之死，荀子年已一百零三岁，荀子其时是否尚在人世已不可知。^[2]故由此推算，即荀子之生年当是公元前340年，卒年则在公元前245年以前。当然，钱先生之考亦只是一家之言。梁启超先生便认为，荀子之出生是在公元前307年，而卒于公元前213年，而罗根泽先生则认为，荀子当生于公元前316年，卒于公元前213年。^[3]总之，有关荀子生卒年的各种说法很多，在尚未发现有力的文献资料之前，我们不能期望有统一的认识。

又，对荀子是否“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也有不同看法。刘

[1]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影印，第303—305页。

[2]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7页。

[3] 梁启超：《荀卿及“荀子”》；罗根泽：《荀子游历考》，均载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四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向在《孙卿叙录》中赞成司马迁的观点，以为“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至齐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但也有许多学者持不同意见，应劭在《风俗通义》便认为：“齐宣王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至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此外，晁公武在《郡斋读书记》以及王应麟在《玉海》中也认为，《史记》中所说的“五十”应为“十五”之误。钱穆先生则认为“五十”应为“十五”之误，盖一者所谓“游学”是特来从学于稷下诸先生，而不名一师，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事也；二者所谓“有秀才”乃年少英俊之称，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名；三者所谓“始来游学”，乃对后之最为老师而言，意谓荀卿始来，尚年幼，为从学，而后最为老师也；四者荀卿于湣王末年去齐，至襄王时复来，则“始来”者又对以后之一再重来而言也。^[4]

此外，关于荀子自齐适楚之时间问题，今略征钱穆先生之考证以为参考。据桓宽《盐铁论·论儒》记载：“及齐湣王奋二世之余烈，南举楚淮，北并巨宋，苞十二国，西摧三晋，却强秦，五国宾从，邹鲁之君，泗上诸侯皆入臣。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侯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按齐国灭宋在齐湣王十五年（前286），越二年，燕国大将乐毅以秦、魏、韩、赵之师攻入齐都临淄，齐湣王逃奔莒地。据此推断，荀子去齐适楚当在湣王十五六年之间，荀子此时约在五十五六岁。^[5]此外，就《史记》本传所谓齐襄王时荀子“最为老师”、“三为祭酒”的记载，依钱先生，齐襄王五年（前279），齐将田单乘燕惠王用骑劫代替乐毅之机，率部反攻成功，襄王才得以从莒地回到临淄，“本传”所谓“齐尚修列大夫之缺”，应在此之后，盖襄王以为稷下之制坏于湣王，故重修政策，恢复稷下学宫，召集亡散学士。荀子是时自楚复返于齐，年已逾六十，而以前的田骈之属皆已死，故荀子最为老师。自襄王六年（前

[4]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387页。

[5]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491页；观夏甄陶：《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7页。

[6]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491页；观夏甄陶：《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06—507页。

[7]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491页；观夏甄陶：《荀子的哲学思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29页。

[8]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499—501页。

268)至襄王十九年，前后约十四年，所谓荀卿“三为祭酒”，当在此一时段之内。^[6]

按刘向《孙卿叙录》所云：“孙卿之应聘于诸侯，见秦昭王。昭王方喜战伐，而孙卿以三王之法说之，及秦相应侯，皆不能用也。”荀子入秦究竟在何年亦颇难确定。《荀子·儒效》篇记有秦昭王与荀子的问答，《强国》篇记有范雎和荀子关于“入秦何见”的问答。按范雎相秦，封应侯，应在齐襄王十八年，即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秦昭王五十年，秦国与赵国在邯郸之战中大败，秦相范雎在国内遭受攻击，至昭王五十二年，应侯罢相。据此，钱穆推定荀子赴秦当在秦昭王四十一至五十二年这十二年之间。^[7]

又，“本传”谓“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依钱先生，荀子去齐适楚当在齐湣王十五六年间，下距黄歇为春申君还有二十余年，则“本传”所言非是。《史记·春申君列传》又谓“春申君相楚八年，为楚北伐灭鲁，以荀卿为兰陵令”。若以此时间推定，即是时荀子已年逾八十，至春申君死，则荀子年已百岁，可见《史记》之说亦非是。钱穆云：“卿纵贪禄好仕，一何老不知退，为弩马之恋豆，至于若是其甚耶？”按钱先生，荀子为兰陵令当在其游赵聘秦之前，盖荀子适楚在湣王末年，当顷襄王之十五年，是年取齐之淮北，兰陵或以其时归楚，而荀卿为之令，非不可有之事。^[8]

依刘向《孙卿叙录》，孙卿为兰陵令，客或谗之春申君，春申君谢之，孙卿去而之赵。春申君辞谢孙卿，孙卿去楚适赵，论兵于赵孝成王前，可从《荀子·议兵》篇中“临武君与孙卿子议兵于赵孝成王前”获得某种证明，但荀子适赵的确切时间已不可考，人或以为荀子议兵之年当在公元前247年，但此只是一家之说，可供参考。钱穆先生则对此别有看法，依钱先生，春申君以荀子为兰陵令一事已不足信，则荀子避谗适赵更加无据。汪中《荀子年表》谓荀子不遇于秦而归赵，齐王建初年又自赵来齐，

至楚考烈王八年(公元前255年,齐王建十年)乃至楚,为兰陵令,终老至死,这种看法亦不足信。按钱穆的看法,荀子自齐避谗适楚,当在湣王季年,其后重返齐国,为稷下祭酒,则在齐襄王时期,至齐王建立位,乃去齐适秦。荀子不见用于秦,返而归赵。故荀子留秦时间不长,而其去秦东归应在长平一役之前(公元前262年),遂留赵而值邯郸之围(公元前257年)。如此推算,荀子与临武君议兵于赵孝成王前,也可能在邯郸解围之后,此时荀子已年逾八十,终老于赵。^[9]

[9] 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第532—533页。

二

荀子之学的具体师承亦已不可考,他推崇孔子,书中也多次提到“子弓”。人或以为“子弓”即是《论语》中的“仲弓”,孔子弟子,又名冉雍,被列为德行科的四学生(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之一。^[10]但从时间的角度,有学者认为荀子师事仲弓的可能性并不大,顶多只是荀子心仪其学而私淑其人而已;此外,仲弓之学毕竟有何特色,其细目已无从知晓。据《论语》一书涉及仲弓者凡四,为《雍也》、《先进》、《颜渊》、《子路》,主要内容似乎与政治外王之事相关。其中,《子路》云:“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子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此章记述仲弓问政,夫子答以举贤才之事;又据《雍也》记载:“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11]此一对话似应蕴涵相当的解释空间。子桑伯子究竟何人已难考实,人或以为就是《庄子·大宗师》所记的子桑户,亦有人以为是秦穆公时的子桑(即公孙枝),但各种说法皆难坐实。若以子桑伯子为子桑户,即子桑户此人之观点据《说苑·修文》的记载应与孔子对反。孔子去见子桑伯

[10] 参见《论语·先进》。康有为认为:“荀子之传,始自仲弓,仲弓当时几于颜氏比,仲弓极盛德,仲弓为伯牛子,见之《论衡》。”参阅《康有为全集》第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567页。

[11] 朱熹《集注》谓:“言自处以敬,则中有主而自治严,如是而行简以临民,则事不烦而民不扰,所以为可。若先自处以简,则中无主而自治疏矣。”从注文可以看出,朱子似乎是侧重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来理解此一对话的。但这种诠释或许在侧重点上并不对焦。

子，而子桑伯子却“不衣冠而处”，引得弟子不快，孔子却说其“质美而无文，吾欲说而文之”，子桑伯子则谓孔子“质美而文繁，吾欲说而去其文”。冉雍求教孔子对子桑伯子的看法，或可意味着其对子桑伯子“简事、简行、简单、居简”的观念心有所属，而从冉雍一大段的发挥来看，冉雍显然是要将子桑伯子“简单”的哲学和儒家“居敬”的哲学结合起来以为治国牧民之纲领。冉雍的主张得到孔子的赞赏，并在同一篇里孔子谓“雍也可使南面”，“南面”即是从政、做官。以上记载或可有两种不同方向的解释，一是仲弓对治国牧民的政治（外王之学）颇有兴趣，一是在治术上仲弓主无为而治的“简单”哲学。当然，上述解释不免含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盖荀子于仲弓之学毕竟所承为何尚难有确定的说法。不过，有一点大体可以肯定，生活于大一统帝国前夕的荀子曾游历齐、楚、赵、秦诸国，其抱负在“处胜人之势，以行胜人之道”（《强国》）。荀子长期讲学于稷下，而稷下在当时是百家争鸣的中心，各流派学者汇聚于此，著书立说，宣扬其理论。据《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12]此类记载又见于《盐铁论·论儒》：“齐宣王褒儒尊学，孟轲、淳于髡之徒受上大夫之禄，不任职而论国事，盖齐稷下先生，千有余人。”荀子深受各家的影响，因此，他的学说具有综罗百家的特点。但此综罗又并非没有主旨、没有立场、没有间架。他对各家各派有怀疑、有论辩、有非难，更重要的是，他对孔儒之学有发展、有完善、有建构，则断无可疑者。

荀子专门作有《非十二子》一篇，对当时各家学说进行了评述，其中涉及的人物有宋钘、墨子、它嚣、魏牟、陈仲、史鳢、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而涉及的学派即有儒、墨、道、法、名等。从《非十二子》篇中我们可以看到，荀

[12] 邹衍、淳于髡为齐国稷下先生；田骈，齐人，游稷下，号天口骈，作《田子》二十五篇；接予，齐人，著《接予》二篇，属道家流；慎到，赵人，战国时处士，作《慎子》四十二篇；环渊，楚人，著书上下篇。

子对上述各家皆许之以“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而独许之以同为儒家一脉的子思、孟轲为罪人，颇为发人深思。如批评它嚣、魏牟“纵性情，安恣睢，禽兽行，不足以合文通治”；批评陈仲、史鳢“忍性情，綦谿利跂，苟以分异人为高，不足以合大众明大分”；批评墨翟、宋钘“不知壹天下建国家之权称，上功用、大俭约而侵差等，曾不足以容辨异、县君臣”；批评慎到、田骈“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反诂察之，则偶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批评惠施、邓析“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琦辞，甚察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批评子思、孟轲“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犹然而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甚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毫无疑问，这些意见皆是荀子站在自身所理解的儒家的立场上加以观察和评判的结果，然而，透过这些批评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各家各派在理论上的特色及其得失，另一方面我们也未尝不可以捕捉到荀子思想的意趣和用心所在，更为重要的是，荀子在反省、批评各家学说的同时，又在他自己的思想体系中吸取各家之长，如荀子对黄老道家、对墨家、名家、法家等等皆非采取简单的否定的方法。在《天论》篇中荀子又云：“慎子有见于后，无见于先。老子有见于诎，无见于信。墨子有见于齐，无见于畸。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有后而无先，则群聚无门。有诎而无信，则贵贱不分。有齐而无畸，则政令不施。有少而无多，则群众不化。”荀子的上述批评，言虽简但意精当。《解蔽》篇又云：“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欲而不知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贤，申子蔽于势而不知知，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在《富国》、《乐论》、《正论》、《正名》、《性恶》等篇中发现荀子对其他各派的不同意见。如此种种批评，人们站在不同的角度，虽不可谓决无可争可议之处，然

而，它透露出一个不争的事实即是，“荀子学问很博，曾研究同时诸家的学说。因为他这样博学，所以他的学说能在儒家中别开生面，独创一种很激烈的学派。”^[13]

[13]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第308页。

三

“哲学开始于一个现实世界的没落。”^[14]

荀子的思想或许可以说印证了老黑格尔的这句话。

荀子是生活在战国末期的一位思想家。依钱穆先生之说，“春秋以下，自周贞定王二年，即鲁悼公元年始，迄于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告成，其间共二百四十六年，后世目为‘战国时期’”。^[15]顾名思义，所谓战国即是国与国之间的争斗，普天之下，各国皆以武力相向。在春秋时期，齐桓公、晋文公成其霸业，礼乐征伐已不是自天子出，而是自诸侯出，但还讲求“尊王攘夷”之大义，至战国时期，则礼乐征伐出自大夫，乃至陪臣执国命。周文之文化理想一去不返，弥漫于世的只是粗俗、粗狂、粗暴的纵情恣肆，各国君王皆沉浸在战争的棋盘中寻找如何强壮自身的良方。^[16]顾亭林在描述战国时期的社会情状时曾这样指出：“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忠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17]亭林之说，今见《孟子·梁惠王》之记载亦可大体看出此类情状。孟子见梁惠王，惠王劈头就问：“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毕竟何谓“利”，此一问题自然最好还是由齐宣王来回答更为清楚。他日，孟子见于宣王问好乐之事，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

[14]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54页。

[15] 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73页。

[16] 牟宗三：《历史哲学》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第100—112页。

[17] 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周末风俗”条，参见黄汝成集释，秦克诚点校《日知录集释》，长沙：岳麓书社1994年，第467页。

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又，当孟子以“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以为交邻国之道而告于宣王面前时，宣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而当孟子向齐宣王宣讲王政之道理及做法时，齐宣王即直接回答：“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好勇、好货、好色、好世俗之乐等等大概就是所谓“利”的主要内容，在表现风格上倒也清清脆脆，爽朗朗朗，各国君主对声色货利冲口而出，毫无遮掩，说喜欢就喜欢，说厌恶就厌恶，确乎其脆快淋漓。牟宗三先生据此认为，战国之精神乃是一尽物量之精神，所谓尽物量之精神即是一任其原始的物质生命的粗狂与发扬，整个时代的精神都陷溺于利欲之中，在强兵富国中表现其爽朗。但在物质生命之奇光幻彩的另一面，则是精神生命的僵固和苍茫，文化理想黯然不彰，周文所凝结的政治格局及文化意义土崩瓦解，所谓“上无贤主，下遇暴秦”，“君上蔽而无睹，贤人距而不受”，天下冥冥，仁者绌约。学术上，看似人人各呈其能，百家各立异说，但却散立而无积聚，不免于浮光略彩，或假言为生计，或趋炎附势，或游离于梦想及愤世泄俗之间……

荀子思想即是在此没落之世中斩截而出的一套系统。孔子莘莘之大，开仁礼双彰之轨辙，而浑无罅缝；孟子十字打开，主仁义内在而力开王道，力主《诗》、《书》。《诗》虽可以兴，《书》虽可以鉴，然却不能止于《诗》、《书》之具体，而当上升至现实组织之客观精神一面，盖客观精神不显，则仁教亦扩充不出，而其欣趣的仁义理想亦不免流而为虚文而已，牟先生认为，“徒人伦之肯定并不足于为客观精神之表现。学术文化上不能发明客观精神之肯要价值，则社会上亦不能表现客观精神，而吾民族亦遂趋于萎靡散漫之境地。”^[18]故荀子特重外王之礼宪，以为构造社会人群之法式，其言群分，言统类，隆礼义而杀诗书，在在以礼义之统之庄严肃整客观化此仁义理想，所谓“总方略，齐言行，知统类，一制度”，由百王累积之

[18] 牟宗三：《名家与荀子》，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第203页。

法度统而一之，连而贯之，而治道可期于大成矣。

荀子以其特定的语言表达着其所处时代的精神的丰富性，这种表达一方面固然尽了其个人的“理念诗”的魅力和特色，另一方面，我们今日读其书，观其文，亦复可以感到其耿介自信、评说世间硕儒博学，刷理不爽秋毫的风格，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气概。荀子之自信心，强盛过人，比之于孟子，毫不逊色，其亦以此自信发而为宏论，在大综合的时代中见其大创作。

毫无疑问，作为先秦时代的一个总结式的人物，荀子不仅在哲学上成就斐然，对传统所讨论的天人、名实之辨，古今、礼法之争等诸方面提出了新的看法，达到了批判总结的高度，而且在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文学、音乐等等方面皆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观念，卓然不凡，被学者认为是最早提出“通儒”概念，且其自身即不愧为“通儒”的儒者。^[19]同时，荀子也一向被认为是儒家经学早期传授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他博学多才，兼通诸经，刘向在《孙卿叙录》中认为：“孙卿善为《诗》、《礼》、《易》、《春秋》。”今只以《诗》为例，据学者研究，《论语》记孔子言论涉及《诗经》的有二十处，《孟子》有四十余处，《荀子》即有九十余处。《荀子》一书不仅引诗用诗最多，而且评诗也最多。许多早期经典赖《荀子》一书得以传衍，故汪中在《荀卿子通论》中认为“荀卿之学，出于孔氏，而尤有功于诸经”。又云：“盖自七十子之徒既歿，汉诸儒未兴，中更战国暴秦之乱，六艺之传赖于不绝者，荀卿也。周公作之，孔子述之，荀卿子传之，其揆一也。”（《述学·补遗》）当然，汪中对诸经典传衍过程之考证，其结论虽不免过当，不必尽从，但其视荀子为传经大师却为许多经学史研究的学者所大致认同，徐复观先生认为：“孟子发展了诗书之教，而荀子则发展了礼乐之教。若就经学而论，经学的精神、意义、规模，虽至孔子已奠其基，但经学之所以为经学，亦必须具备一种由组织而具体化之形

[19] 参阅陈昭瑛：《“通”与“儒”：荀子的通变观与经典诠释问题》，载氏著《儒家美学与经典诠释》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05年，第91—115页。

式。此形式，至荀子而始挈其要。”^[20]

对于荀子在儒学思想中的地位，今摘录清代学者凌廷堪和康有为的相关说法以为参考。^[21]凌廷堪在《荀卿颂并序》中云：

“夫舍礼而言道，则空无所附，舍礼而复性，则茫无所从。盖礼者，身心之矩则，即性道之所寄焉。时至春秋，即升降裘褐之节，鼎俎笾豆之数，士大夫已渐不能详言之，况礼之深焉者乎？降而七雄并争，六籍皆阙，而礼为尤甚。纵横捭阖之说，坚白同异之辨，淆然而不可纪，杂出而不可穷。守圣人之道者，孟、荀二人而已。孟子长于《诗》、《书》，七篇之中，称引甚广。至于《礼经》，第曰‘尝闻其略’。考其父命阙子，已与《士冠》相违；往送之门，又与《士昏》不合，盖仅得礼之大端焉耳。若夫荀卿氏之书也，所述者皆礼之逸文，所推者皆礼之精意。故戴氏取之以作记，郑氏据之以释经。遗编具在，不可诬也。夫孟氏言仁，必申之以义；荀氏言仁，必推本于礼。推本于礼者，譬诸鳧栗之有模范焉，轮梓之有绳墨焉，其与圣人节性防淫之旨，威仪定命之源，庶几近之。然而节文器数，委屈繁重，循之者难，则緼之者便，好之者鲜，则议之者众。于是乎荀氏渐絀性道，始丽于虚，而仁为杳渺不可知之物矣。孔子之论仁，曰：‘克己复礼’，又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然则荀氏之学，其不戾于圣人可知也。后人尊孟而抑荀，无乃自放于礼法之外乎！”^[22]凌廷堪乃清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礼学家，其评判荀子有其自己立言之问题意识，盖凌氏所处时代乃礼学大盛的时代，以礼代理，以实实行代虚玄影响，一时成为人们为学致思之主要方向。凌氏紧紧抓住荀子礼学之于儒门之意义，既有观念史之说明，亦复有理论之点发，其用心当不难理解。康有为则在《桂学答问》中认为：“孔门后学有二大支：其一孟子也，人莫不读《孟子》，而不知《公羊》正传也；其一为荀子也，《穀梁》太祖也……太史公以孟子、荀子同传，又称‘孟子、荀

[20] 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1982 年，第 34 页。

[21] 史上对荀子之评价的言论甚多，排荀、尊荀者皆有之，故此处举凌廷堪、康有为之言非刻意为之。但儒家言仁、言礼，亦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偏废，此则非党见所能掩也。

[22] 凌廷堪：《校礼堂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998 年，第 76—77 页。